



民国社会百态

绕梁三日的歌唱声里，掩不住阵阵哽咽；飘飘欲仙的舞姿背后，饱含着满腹心酸。你可知道，天姿国香的妓女们的斑斑血泪？你可知道，靠卖身为生的苦女子的凄惨生活？罪恶的旧上海，娼妓兴盛为全国之冠。本书详细介绍了这一制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当时状况，着重叙述了号称烟花魁首的5位名妓坎坷悲凉的一生。



旧上海 娼妓秘史

孙国群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JIUSHANGHAI CHANGJIMISHI



the following year. He was
then appoin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where
he lectured on the
Bible and the
Scriptures. In 1838 he
was elected a
Fellow of the
University.

10 of 10

10 of 10

日上旗
加士敦

旧上海娼妓秘史

孙国群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旧上海娼妓秘史

孙国群

责任编辑 潘 潘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5.375印张103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0册

ISBN 7-215-00242-X/K·67

定价 1.45 元

引　　言

娼妓，是以女性为玩物、行娱乐的特殊社会行业。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十里洋场的旧上海，这一行业是社会经济收入的一大支柱。今日书店林立的福州路，则是昔日妓女的大本营。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时分，丽姬艳妓，倚窗而坐，管弦声沸，热闹非凡。浓妆艳抹，脂香粉腻的野鸡，如水如云涌向街头巷尾、茶肆酒楼游戏场，招揽生意。旧上海卖淫人数之多，等级门类之繁，不仅冠甲全国，而且一度号称世界娼妓之最。这支庞大的娼妓队伍，是旧上海罪恶落后，贫富悬殊的一个突出标记，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病态社会里的一个恶性肿瘤。

娼妓制度，是私有制的产物。娼妓以卖淫求生的现象，是一种普遍的关系到社会制度的历史现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到“随着财产不均现象的产生，亦即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伴侣，也出现了与强制女奴隶献身于男性的现象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①这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2页。

DAT97/2008

• 1 •

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娼妓及娼妓制度与财产不均的私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娼妓制度是与私有制并存的，它是作为一夫一妻制衍生物和对立面发展起来的，是保证私有财产继承为目的夫权制家庭，名义上的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因此，卖淫一开始，便被私有制社会所承认，确立为制度。国家藉此征收税金，刺激城市的发展，工商业的繁荣；娼妓业经营者以此牟取暴利；贫民及无职业者的女儿为了救助家庭把卖笑生涯作为一条觅食之路。尤其到近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半殖民地经济畸形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娼妓制度更加恶性繁衍。

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以男子为中心的私有制社会里，娼妓制度是男子压迫女子的一种极其野蛮的形式。娼妓的价值只是供男子娱乐消遣的玩物，供男性驱使的性奴隶。她们没有人格，没有个人意志，完全丧失了“人”的概念，只不过是供男子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古今中外都视娼妓为贱人，一个女人沦为娼妓便是跳进了火坑，是最大的不幸。

因此只有在铲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娼妓及娼妓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男女平等，同工同酬，妇女的经济独立，社会地位提高，娼妓制度才能彻底消灭。解放初期，上海取缔娼妓，改造妓女新生的事实就是明证。

旧上海的娼妓问题，是研究上海社会史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上海妇女生活史的一个侧面，今天研究这个课题，可以使人思辨，给人以启示和进取。但是，

旧上海的娼妓制度极其复杂，在史学研究中还是一块处女地。笔者为了揭露这一罪恶制度，跑了上海的几处有关档案部门，但所得寥寥，只能查阅工部局年报，旧上海的报刊杂志，中外人士的笔记日记等旧式文人的记载。虽然对大量资料进行了分析鉴别、去伪存真的工作，力求比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这一制度的历史线索和种种罪恶内幕。但是，限于个人理论水平不高，资料琐碎，缺乏出自妓女本人手、口的第一手资料，因而片面谬误之处恐有未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承蒙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洪林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哲永老师在百忙中通读了全稿，并提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还得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郭绪印老师的许多关心和帮助；在收集资料过程中，上海图书馆、上海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资料室、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师大图书馆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热心为我提供方便。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

1987年10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目 录

引 言	(1)
一 近代上海的繁荣和娼妓业的发达	(1)
1 道光年间上海妓院风气初开	(1)
2 “十里洋场”的建立和娼妓业的发达	(4)
3 上海烟花冠甲全国	(13)
二 近代上海妓院概况	(22)
1 妓院的等级和种类	(22)
2 妓院的形式和格局	(51)
3 妓女的来源	(54)
4 训练妓女	(58)
5 营业隐语和规矩	(64)
三 卖笑业的一种特殊广告——花榜	(71)
四 人间地狱里的妓女生涯	(79)
1 龟鸨对妓女的剥削压迫	(79)
2 肆客对妓女的摧残蹂躏	(85)
3 社会恶势力对妓女的欺压	(89)
4 受害者害人	(93)

5	妓女的悲惨归宿	(97)
五	青楼女子的觉醒	(100)
1	青楼进化团	(100)
2	风尘弱女的爱国行动	(104)
3	侠义助志士的佳话	(105)
六	娼妓制度的消亡	(110)
1	旧上海的禁娼废娼	(110)
2	消灭娼妓 改造妓女	(113)
附录一	清末上海几个名妓的辛酸史	(121)
附录二	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	(145)
附录三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161)

一 近代上海的繁荣 和娼妓业的发达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后，以它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步成为帝国主义在东方的一个国际市场。商业、工业的日益繁荣，使上海代替历史上的东南大都市扬州、广州而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称之为“十里洋场”的租界是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娼妓业便“依洋人为护符”，“趁风骈集”迅速发展。每逢国家风云变幻，租界便成为各省官僚、财主避难的世外桃源，而青楼之盛，也总是倍于从前。于是，上海娼妓事业的畸形发展便和工商业的繁荣，租界的扩展并驾齐驱，而冠甲全国。

1. 道光年间上海妓院风气初开 (1821—1850)

上海地处南北海岸线的中央，长江下游的支流——黄浦江把上海和3,000里江水沿岸各省联接起来，无数的水网把上海和号称人间天堂的苏州、杭州联成一片，富庶的长江三

角洲向上海输送各种各样的商品。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已是一个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东南都会。久负盛名的上海棉纺织品，以经久耐用、色彩鲜艳驰名全国，吸引各地“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客货往来不绝的水陆交通线，把产茶区、产丝区和产棉区的茶叶、生丝、棉纱载到上海；闽广转口贩运商，每年载来广州进口的洋货，然后“皆装布囊累累”而去。上海黄浦江内终年集泊着闽、广、辽、沈等省的货船。

上海城内，人烟稠密，商贾辐辏。或以富著，或以豪称。社会经济的繁荣，吸引着各方名流贤士纷纷前来。公余之暇，少不得寻花问柳，张灯开宴，以挥霍为自豪，以一掷千金逞风流。于是，姑苏名花，江淮乐户，纷纷来沪，妓院风气由此而开。

道光以前，上海城内还没有妓院。那时黄浦江内停泊着许多商船，“土人每以舟载妓应客。舟子辄高声呼曰：客欲唤妓乎。客应，即移棹至矣。”这种船制作精美，陈设华丽，窗明几净，锦榻银屏，丝竹笙笛，无不具备，如同秦淮画舫，拂晓即去。亦偶与外轮船上的外国商人结交。那些外国商船都为白色汽船，俗称白肚皮船，都停泊在黄浦江心。船上外人所饮之酒，称“红毛酒，贮以玻璃瓶，色红味甘，辣如丁香，功胜媚药。”杨征男在《淞南乐府》一文中写妓女登白肚皮船情景说：“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罗袖争春登白肚，玻瓶卜夜醉红毛，身世总酣陶（mǎo tǎo，大醉状）。”在靠近虹口的黄浦江面上“有西洋妓艘，岁一二至。华人之能效

其语言者，可易服装而往，缠头费亦仅二十余金。”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城内开始出现妓院。虹桥左侧最集中，妓家鳞次以居，各分门户。有苏、常来的，扬州来的，也有本地人。其他散居于唐家弄鱼行桥南的东弄，阑水桥西的西弄、梅家弄、鸳鸯厅，虹桥西南白栅西面的仓桥，南面的张家弄附近。多数是住家妓女，一家一二个妓女。

上海是清中叶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妓院都承袭扬州、苏州及宁波官妓的旧习，崇尚风雅。住处偏僻幽静，房屋均白墙青瓦，粉壁明窗。室内布置雅致、洁净。名妓多数来自吴，所以修容饰貌，衣服式样，都取吴式。妓女中负盛名者有王月仙、褚云孙等，均以秀丽多姿而闻名。上海县城中以财雄居，以侠著名的富商士绅、名流学士，粤中来沪的富商巨贾，都竞相寻访。每到更深人静时，琴韵箫声，饮酒猜拳声响彻墙外。

游妓院者都为逢场作戏、调丝品竹、征曲开觞而已，宿娼者甚鲜。惟有富豪及过路官吏，每月出一定数目的钱，包一个妓女作临时老婆，供给她一切挥霍的费用，但是，在此期间，这个妓女必须闭门谢客，不再接其他客人。实际上，往往此客前脚出门，旧时熟客便接踵而至。当时上海城内，妓院寥寥数十家，妓女几十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海租界建立以后。

2. “十里洋场”的建立和娼妓业的发达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以中国战败而告终。1842年8月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上海便是规定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

1843年11月的一个晚上，“水怪号”轮船载着驻上海第一任英国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第二天早晨，得到通知的上海地方官，派了一批搬运夫和几乘轿子，把第一批来上海开埠的殖民主义者抬到道台衙门。道台客气地接待了他们，衙役燃放了6个很响的爆竹以表敬意。

上海县绅士姚平书是城内有名的富商之一，又是香港一家中国商行的合伙人，他以每年400元房租把上海城内街上的一幢房子租给巴富尔，这幢有陈设华丽的52个房间的房子，就成了上海的第一个英国领事馆。自此，上海正式开埠。

上海开埠的第一年，商人住在城外居民的房子里，白人走到那里，后面总跟着好奇的中国人。巴富尔居住的领事馆也如此，一开始城内居民象上博物馆那样，去参观外国人的生活起居。巴富尔感到极不自在，似乎什么事情都受到中国人的监视。于是，领事的第一件事就是迫切要求设立租界，让外国人居住和做生意，改变这种天天处于中国人包围中的杂居局面。他选中了黄浦江边一片芦苇丛生的沼泽地带。

1845年，巴富尔根据《南京条约》的附约《虎门条约》

第七款，“中国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的规定，向上海地方官提出划租界地的要求。当时的上海道官慕久怯于英国殖民者的勒索，也认为中外杂居有所不便，华洋分居可以减少麻烦。认为把外国人安顿在一个划定的圈子里，也未尝不可。于是，官慕久便和巴富尔签订了《上海地皮章程》，划定黄浦江以西800亩土地为英租界。1848年发生了三名英国传教士违反“外人行走之地，以一日往还，不得在外过夜”的规定，闯入青浦，并和当地漕船水手发生争殴的“青浦事件”。英国便乘机勒索土地，把租界扩大，形成西至泥城浜（今西藏路），北至苏州河边，南界仍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的局面，整个租界面积达2,820亩。

英国开了先例，其他列强也紧紧跟上。1848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看到苏州河北岸虹口地方地价低廉，便趁机大量购买土地，建造教堂。既成事实之后，便向上海道台交涉，逼令把虹口一带划为美租界，面积约7,856亩。

继英、美之后，法国也于1849年向上海道台勒索到自上海县城（北门外城河）至英租界的南界洋泾浜（1919年填浜筑路，为今延安路）之间的大片土地，总面积约986亩。

此后，各租界又屡次用“越界筑路”等手段扩大租界面积，建立起“十里洋场”。

1863年，英美租界因界内治安不容易管理，而合并为公共租界。自此以后，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的80多年中，上海就是由所谓“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南市、闸北、

浦东)三个部分组成。

租界初建时，人口稀少，寂寞冷落。在1845年到1853年的8年间，租界逐步开发。一条条泥泞的小路，修筑成了横直马路，两旁逐渐开设起洋行、店铺。但根据上海道官慕久主张的华洋分居制度，租界为外人居住地。这时租界内仅有外国人约200人，为外国人服务和开设店铺的华人500人。1853年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城内大批中国人逃入租界“避难”，在洋泾浜沿岸搭起木屋、草棚等各种简易房屋。因清军和小刀会起义军继续作战，租界华人日益增多，到1855年时租界人口达2万人以上。

那些抱着到中国来发横财的外国冒险家，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进租界，瞅准了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认为“这些高尚和富足阶级的人来和我们居住一起，如同一注本钱。”于是大肆投资房地产，建造各种简易住房，然后以十分昂贵的租金，出租给逃难的中国人，牟取厚利。到1860年时租界已有3,000座洋式楼房。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外国侵略者看到太平军在短短2年多时间里，连克十多个省，清军则一败涂地，望风而逃，所以表面宣布中立。太平军北伐西征，进军浙江，东征苏、常，所到之处夺地抗租，设乡官，建政权。在太平天国势力范围里，地主富户纷纷挟资仓皇逃跑。上海租界成为江浙各地财主心目中可避兵祸，人身财产可保安全的地方，纷纷不惜重金租住洋房，过起海上寓公的生活。租界人口猛增，1860年太平军首次进攻上海时，人口达30万，1862年第二次进逼上

海时，又激增到50万人。而当时租界中外国人仅569人。

租界人口的增多，刺激了各种商业的发展，娼妓业也应运勃兴。当1853年小刀会占领县城时，城内妓院先后迁到城外。开始时在洋泾浜一带，随着马路增多，租界繁荣，妓院便由南向北发展。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实行禁娼，秦淮名妓、扬州、苏州等大中小城市的妓女纷纷南逃上海，杭州、宁波等地的妓女也都聚集到上海，上海娼妓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十里之间，琼楼绮户相连缀，阿阁三重，飞甍四面，粉黛万家，比闾而居。昼则锦绣炫衡，异秀扇霄。夜则笙歌鼎沸，华灯星灿，入市如天仙化境。”

当时租界对于妓院采取放任态度。于是，“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租界扩展到哪里，妓院也跟着开到那里，竟至60年代“有名数者”就有1,500余家。

1865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字林西报》报导，华人住户10,063家中，有668家是妓院，占1/12，烟间还不在内。其实，烟妓在上海的数目也极为可观，在上海租界人称土店多于米店，烟馆多于饭馆。可见在租界建立后的短短20年中，上海娼妓业发展之速，数量之多，甚为惊人。开妓院而积资巨万，成为富豪者的不乏其人。

但是，五六十年代上海的繁荣是太平天国革命期间，上海人口激增刺激出来的。1864年太平天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围剿下失败，其余波也逐步平息。暂居上海的一批江浙财主、

巨商陆续离沪还乡，上海租界人口骤减。商店生意清淡，商业萧条，房地产价值暴跌，租界财政出现危机。勃兴一时的青楼红粉生涯也大受影响，一些高等妓院真有捉襟见肘之势。

而南京、苏州一带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不久，又出现了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实行禁娼，娼妓销声匿迹。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后，“欲兴商业，效管仲之设女闾”，制造虚假的太平景象，发布弛娼令，设陆、李、刘、韩等官妓6院，广招四方游女。没有几个月，秦淮河上便灯火箫鼓，恢复当年盛况。曾国藩还亲自约了几个幕僚买棹游览，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渡口，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吴门画舫，经驻苏巡抚张文达的提倡，也繁盛如前。原来逃到上海的一批名妓都闻风而奔苏州、南京。60年代中期上海高等妓院便略有减少。

然而，没过几年，随着上海成为经济和外交的中心，上海娼妓业又振兴起来。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各国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攫取了外国商船在长江各口通商的内河航行权，长江各口的开放，招引欧美商贾连翩而来，上海港代替了昔日广州，成为进出口商品的吞吐港。各种洋行争相开设，服务于外商的买办队伍迅速扩大，他们以洋泾浜英语周旋于中外商人之间，成为中外贸易不可缺少的中介人。上海港的繁荣又招致内地丝茶贩运商蜂拥而来，上海成为中外贸易的商业重地。

上海又是洋务工业的一个重要基地。1865年李鸿章在上